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明 清 文 学 史

(清 代 卷)

唐富龄 编著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明清文学史
(清代卷)
唐富龄 编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千字
1991 年 月第 版 1991 年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__

ISBN7 - 307 - 00990-O/ K·78

定价 5.60 元

目 录

上 编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清初文学	
第二节 清中叶至鸦片战争前文学	
第二章 文言小说高峰的回归及清代文言小说的流派	
第一节 以《聊斋志异》为主体的文言小说高峰的回归 及其成因	
第二节 清代文言小说的流派和高峰余脉	
第三章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矛盾	
第二节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小说与妇女形象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垒块愁”与时代感	
第四节 真幻相生的艺术成就及其与民间文学的关系	
第五节 《聊斋志异》的情节结构和人物性格刻画	
第四章 章回小说的落潮与回升(上)	
第一节 历史演义小说的徘徊	
第二节 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的回响	
第五章 章回小说的落潮与回升(下)	
第一节 人情小说的勃兴	
第二节 才子佳人小说	
第三节 多向型小说及其他	

第六章 讽刺文学的丰碑——《儒林外史》
第一节 讽刺文学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 吴敬梓的生活创作道路
第三节 封建末世的儒林解剖图
第四节 理想的光辉与时代的局限
第五节 精湛的讽刺艺术

第七章 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红楼梦》
第一节 《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创作观
第二节 红学的发展与对《红楼梦》认识的深化过程
第三节 《红楼梦》的批判精神、时代特色和主题思想
第四节 《红楼梦》的理想色彩与悲剧美
第五节 伟大的写实艺术
第六节 语言美及其他

第八章 剧坛的盛衰变化
第一节 概貌
第二节 苏州派主要代表作家李玉
第三节 苏州派的其他代表作家
第四节 苏州派以外的作家

第九章 剧苑奇葩——《长生殿》
第一节 洪升的思想矛盾与创作
第二节 文学史上的李、杨故事和《长生殿》的
成书过程
第三节 《长生殿》的主题思想
第四节 《长生殿》在传奇发展史上的艺术贡献

第十章 古代历史剧的高峰——《桃花扇》
第一节 古代历史剧的发展脉络
第二节 孔尚任的生平思想和《桃花扇》的创作过程
第三节 桃花扇底看南朝
第四节 《桃花扇》的人物形象系列
第五节 古典历史剧的典范

下 编

第一章 诗坛的成就(上)
第一节 清诗概貌
第二节 遗民诗人的忧患
第三节 钱谦益和吴伟业
第四节 清初其他诗人

第二章 诗坛的成就(下)
第一节 性灵派诗人
第二节 清中叶其他诗人

第三章 启蒙主义诗人——龚自珍
第一节 龚自珍的思想体系
第二节 开一代风气的诗歌
第三节 诗歌的浪漫特色和影响

第四章 词的中兴与嬗变
第一节 词坛概貌
第二节 朱彝尊和浙西词派
第三节 陈维崧与阳羨派
第四节 纳兰性德和其他词人
第五节 张惠言和常州派

第五章 清代的散文与散文理论
 第一节 散文的丰收
 第二节 桐城派及其流变
 第三节 骈文的中兴及其他

第六章 清代的诗论
 第一节 明末清初文学思想概述
 第二节 清初的诗论——叶燮的《原诗》和王士禛的
 神韵说
 第三节 清中叶的诗论——格调说、肌理说与性灵说
 的对立

第七章 清代的小说理论
 第一节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
 第二节 毛宗岗和张竹坡等人的小说理论

第八章 清代剧论
 第一节 金圣叹的剧论
 第二节 李渔的剧论体系

第九章 民歌与讲唱文学
 第一节 民歌时调
 第二节 讲唱文学

后记

上 编

第一章 概 论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政治黑暗,“人务竞奔,苞苴恣行”。残酷的压迫剥削,使得“民不堪命,怨声四起”,终于导致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彻底埋葬了腐朽的明王朝统治。紧接着,清统治者与以吴三桂为代表的部分汉族官僚地主相勾结,对农民军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与镇压;同时消灭了南明政权,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秩序。自1644年清政权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止,它对中国的统治长达268年。如果从1616年努尔哈赤即大汗位、国号大金和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由大金汗进位为大清皇帝算起,其政权延续时间则更长一些。总观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分为清初、清中叶和晚清(通称近代)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与之相连的社会心理状态,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并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文学的创作风貌。进入近代以后,情况尤为特殊,构成了在社会性质和文学性质上均有别于初、中叶时期的特点,我们将另书介绍。

第一节 清 初 文 学

一、社会状况、社会心理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清初文学与明末文学联系很紧,一是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矛盾有很大的延续性,二是这时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在明末已经成名,由明入清后,又继续从事创作活动,取得很大成就。所

以我们在清初文学中所涉及的作家作品,从一定范围来说,实际上包含了部分明末文学的内容。

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海立山飞的历史年代里,人民既表现出了转动乾坤的伟大力量,也蒙受了深沉的灾难。清王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农民军和各种反清势力进行了血腥镇压;另一方面,面对着“万井寒烟,千家空杵”,“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的现实,也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措施,从而使整个社会出现了由大动荡到渐趋相对稳定的局势。这种局势的出现及潜伏于其中的各种矛盾,与统治者所实行的各种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政治上看,除兵制以八旗为根本外,其余皆承明制,实行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建立了满汉贵族合流但又以满族为核心的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政权体系。从经济上看,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虽然在封闭体系中使凋蔽不堪的农业有所复苏,但同时也使明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一度受挫,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直到乾隆年间,这种因素才又重新获得生机。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最基本的一点是沿袭宋明理学的统治。为此,康熙皇帝相当重视李光地、汤斌、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及陆陇其等“理学名臣”,并举经筵,让熊赐履等为之讲解《四书》、《五经》;还组织编印《性理精义》,重刊明代《性理大全》,颁布全国;又于康熙二十三年御书“万世师表”于孔庙大成殿,颁行天下学宫,并将朱熹地位抬得很高,认为其“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影响所及,出现了“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然杜其聪明,见者无仁智之殊,论者少异同之辨,习者莫有温故知新之议,不能无蔽也。顾科举之行久矣,

言不合朱子,率鸣鼓百面攻之”的局面。但一切无非都是宋明理学的翻版,并没有摆脱明中叶以来出现的理学危机。

为了利用知识分子为媒介,使这种岌岌可危的官方哲学深入人心,以作为维护政治统治的思想支柱,并吸引知识分子,使之效力于封建政权,清统治者采取了羁縻与高压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羁縻的一面是主要的,如礼葬崇祯,擢用降吏,特别是在一度犹豫,权衡利弊之后,决定袭用明代八股取士制度,以作为笼络知识分子的主要手段。又开博学鸿词科,以作为延揽俊彦的补充形式。还组织大批知识分子纂修各种大型类书、丛书,如张英等辑编《渊鉴类函》,张玉书等编《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张廷玉等编《骈文类编》,还有《子史精华》等以及一大批“御纂”和“钦定”的注经作品的出版,都是为了“稽古右文,崇儒兴学”,并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高压的一面,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严禁文人结社;二是禁毁碍书籍;三是大兴文字狱。清初文人结社,黄河以北虽然也有,但主要在大江以南:“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南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甬上,三吴则松陵……”这些社团,无论是放浪江湖,寄情诗酒,还是企图有所作为,显然都不利于清王朝统治,所以从顺治时开始,便屡有禁令。书禁亦严,张煌言、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屈大均、戴名世等人的著作,都干禁令,不准流行。至于文字狱,顺治时虽曾通过“科场案”等对文人大加诛戮流放,但那是在整饬科场积弊以消弥众怨的幌子下进行的,并不涉及诗文的思想内容。康熙时,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地位,便大肆通过文字狱来箝制思想,清肃反清意识。著名的庄廷钺《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都是由于触犯了清统治者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即因不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眷恋明王朝而兴大狱,被流放和被杀害者分别为数

朱彝尊《曝书亭集·道传录序》。

杨风苞《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

百人。

这样的社会形势和清统治者所采取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思想文化政策,对当时不同阶层和具有不同思想基础的人们的心理结构、审美观念以及文艺创作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明清易代之际最初几十年中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来看,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以陈子龙、张煌言、夏完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杜濬、归庄、吴嘉纪、屈大均以及陈忱、董锐等人代表,或积极从事反清武装斗争,直至慷慨牺牲;或以遗民自居,决不屈事清朝,至少是不赴考,不受征召,甘心老死于山林泉石之间。他们既存在“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族间之”等汉族国家正统观念,又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中,升华出了某种对狭隘民族意识有所突破的治乱兴亡理论:“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肉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心理气魄与对清王朝的仇恨心理相交织,使他们的文学作品在驼棘之感,故国之思的基调中,往往包含坚贞不屈,愤激难平,慷慨悲怆等强烈的反抗情绪。这一部分作家和作品,在当时的文坛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第二种以钱谦益和吴伟业为代表,他们以明臣而出仕清廷,但又眷恋故国,不满新朝,存在着大节有亏的沉重心理负荷。他们的作品与遗民作家们的作品在内容上虽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入清后的诗文,则更多地带有沉郁苍凉、凄艳缠绵的色彩,还时或流露出某种无可奈何的忏悔之情。第三种是一部分由明入清但未出仕清朝或出生在清初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经历各异,但在心灵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时代创伤的某些阴

王夫之《黄书·原极》。

黄宗羲《原臣》。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影。有的人惴惴不安,惧贾文祸,但又难于抑制内心的牢骚不满情绪,如海虞冯舒因“语涉讥谤”,被邑令害死后,其弟冯班在《寄赠瞿叔献》中说:“近事欲言言不得,寄书惟有劝加餐”;著名诗人查慎行《送赵秋谷宫坊罢官归益都》四首之一云:“竿木逢场一笑成,酒徒作计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见,摇手休呼旧姓名。”之四云:“南北分飞各怅天,输他先我著归鞭。欲逃世网无多语,莫遣诗名万口传。”诗中反映了在演《长生殿》之祸以后那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情绪和惊弓之鸟的畏惧。剧论家李渔也在作品中流露出“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端”的不满,这都是当时的高压政策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灵上的投影。有的人对清统治者曾一度心存幻想,但当这种幻想在现实中破灭或半破灭,使他们感到事与愿违时,便往往从对现实的不满出发而追究明清易代的历史教训,从而唤起他们因受遗民思想影响而沉积于胸中的某种民族意识,构成复杂的心理状态,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作品中宣泄出来。洪昇和孔尚任是这类作家的代表。

以上几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不同心理层次,是当时社会心理结构中最为敏感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作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对悲壮美、感伤美和怪诞美的追求与欣赏,对寓意性、象征性和影射性等手法的特别重视;由追慕理想的规范到进一步面向严峻的现实,浇垒块,泄孤愤,构成了这时进步的小说、戏曲和诗文共同创作倾向。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下,大都能适应人们的欣赏要求,特别是在遗民和对现实不满的人中引起强烈共鸣。《桃花扇》演出时坐无虚席,唏嘘而散和《聊斋志异》家弦户诵,未刻之前“已贵洛阳纸价”的情况,都能说明这类作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

康熙后期,客观情况有了重要变化,一是明末遗民大都自然消亡;二是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其宽猛相济的两手政策更为奏效,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驯化成现行秩序的拥护者,并力求在适应这种秩序的过程中获得心理平衡。这时,不满现实,干预现实

的作家和作品虽然并非没有,但总的来说,直接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者日渐稀少;吊古抒怀,模山范水,片面追求技巧的作品则迅速增加。它反映了在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社会局势相对稳定下一种要求淡化现实,追求空灵雅淡的审美趋向。王士禛和朱彝尊是这类作家的代表。

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同类型作家的作品,既有某种相通的时代风格,也往往表现出各自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同一作家的作品,也常常由于思想感情、美学情趣的变化和时空的推移而呈现出稳定统一中的多样差异。这种种因素的结合,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色彩斑驳而又主体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进步思潮的崛起

明清之际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潮曾给予当时和以后文学以直接或间接影响,而这一时期的进步文学,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这种思潮的某些特征,同时也壮大了它的声势,两者关系极为密切。

这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仍然是程朱理学,但它已是破绽百出,正朝着衰亡继续转化。与此同时,明末农民大起义用武器的批判所揭示出来的各种尖锐矛盾,引起了许多进步思想家的严肃思考,他们居危思变,由封建社会的危机中引发出一种变革意识,在继承传统民主思想的基础上,用批判的武器对封建社会的许多重要问题和封建意识中最落后的程朱理学进行了剖析与抨击,从而形成了一股影响颇大的社会思潮。这种在当时属于“现代意识”的思潮,主要由三股力量组成:一是以黄宗羲、唐甄、戴震等人为代表,继承了宋代陈亮、叶适、明代泰州学派的王艮、颜农山、何心隐,以及李贽、公安三袁等人的儒学异端传统,并加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市民意识色彩;二是以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代表,与宋代的张载、明代的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思想一脉相承,更多地承袭儒学的思想材料,发扬古典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批判与匡正程、朱、王、陆的理论,具有较多的哲理思辩色彩;三是以顾

炎武为代表的崇实致用,反对心学和要求刷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虽然存在差异,但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宋明理学方面,在阐发一些富于近代色彩的新命题方面,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它对文学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提倡“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和“经济致用”的社会功利,反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顾炎武、傅山、李颀、颜元等人都很强调“多学而识,行必有果”的“实学”原则,认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那些以“全不谋功计利”而自命清高的理学家们不过是一些腐儒,甚至于对某些只知矜尚民族气节而无补于社会的人也以“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讥之。这种思想反映在文学观上,就是要求作家正视现实,干预现实,做到“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这对当时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扬,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二,强调民本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家们生当乱离之年,目击了社会的腐败和民生的多艰,又熟悉民主思想传统,注重实际调查,因而能在当时君主专政达到极至的社会背景下,孕育出强烈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黄宗羲的政治专著《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原法》等篇,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它以“利”、“害”论为基点,剥去了君权神授的外衣,大胆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它认为君臣之间并非主仆关系,因而臣子不应盲从和屈服于无道昏君;它批判了不平等的封建法规,提出了“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的贵贱观。颜元《潜书》中的《抑尊篇》、《鲜君篇》等,也猛烈抨击君主专政,得出了“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结论。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特别是市民阶层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并在法律上获得平等权利的愿望和要求。

顾炎武《与人书》三。

《室语》。

其三,反对“重农抑商”,鼓吹“工商皆本”。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中批驳了“工商为末”的世儒之见,指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王夫之、颜元等也主张将历来受人轻视的商贾,提到与农相等的地位,这都是针对清统治者“重农抑商”的保守观念而发的,它有利于在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影响下的市民意识继续向文学领域渗透。

其四,反对思想束缚,批判八股取士制度。从明代以来实行的八股取士制度,在“代圣贤立言”的幌子下,早已成为禁锢思想,扼杀个性和摧残人才的罪恶制度,思想家们对此作了多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它所造成的脱离实际,专事模拟,孤陋寡闻的浮薄学风;二是批判它对人才的毁坏;三是指出它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危害;四是驳斥为八股取士辩护的论调,并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吕留良在《古处斋序》中对八股文束缚个性的危害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指出它所培养的不过是些“无只字而非其套”的文抄公,造成了“套也者,三百年来文人之本领也”的严重后果。顾炎武则反复指出,在八股取士的指挥棒下,士子们变得那样孤陋寡闻,目光短浅,名利薰心,他们“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由这种渠道培养出来的必然是些“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的废物,他们出仕则多为贪官墨吏,居乡则无非游客豪绅,因此,它的危害有甚于焚书坑儒。黄宗羲还用探囊取筹的比喻,嘲讽了认为科举可以选出功名气节之士的观点。这种批判,不仅与当时和此后文学领域对科举的抨击相呼应,还对帮助作家们摆脱思想束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五,反对“存天理,灭人欲”,肯定情欲的合理性。理学家视

《日知录》卷十六

《日知录》卷十七。

见《明夷待访录·取士》。

“天理”与“人欲”为不能相容的两端,要将一切有悖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言行全归于“物欲”而加以禁绝。这种理学观念,在晚明时已经受到王学左派的批评,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则进一步揭去了所谓“天理”的神秘外衣,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人性与后天生活环境的关系,否定了先验性的天理。与此同时,还理直气壮地肯定了情欲与私利的合理性。黄宗羲对极端封建专制主义批判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因为君主为满足一己之私欲而扼杀了天下人之所欲;顾炎武认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人之常情;王夫之认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颜元更明确指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不能没有情欲,而男女之情,则是“人之大欲,亦人之真情至性也”。有的人如王夫之、戴震等还试图从更高的层次上探讨人的本质和文明进化的过程。所有这些,实际上是对人的基本价值的自我肯定,它与个性解放的要求有许多相通之处。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进步思潮的许多方面都是在批判中世纪禁欲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要求挣脱封建束缚的朦胧觉醒。这种觉醒,只有在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已经出现,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种种封建束缚有所松动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虽然这种条件在清初曾一度遭到破坏,但这种已经开始的觉醒,并未完全被重新禁锢起来。思想家们所阐发的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理论,不仅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中给宋明理学以有力的冲击,同时也对当时和此后的进步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文学创作在内容上的反封建精神和要求抒发个性的倾向,在形式上的反模拟、反格套和要求具有独特品格的倾向,以及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等等,都与这时的进步思潮有着自觉或不自觉的联系。了解这种联系,有利于把握这一时期乃至整个清代文学的特征。

三、文学的层面和特点

我国古老悠久的文化,发展到明清之际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

历史积淀,并开始进入了它的总结时期。如果说清中叶乾隆年间是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最后高峰期,那么,此前百余年则是这一高峰的前期或次高峰期。文学领域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但它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和层面,形成了不同于此前文学的某些特色。

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诗、词、文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一去不返,但较之元、明,则又出现了全面振兴的局面。作家作品数量之多,不仅与这时的小说、戏曲作家相比,占有压倒优势;与唐、宋诗文作家相应对比,其密集程度也有所提高;而其质量,则是“驾元、明而上”,特别是在诗词领域,形成了唐、宋以后的创作高峰。诗歌创作的主体是数以百计的遗民诗人,他们以其风格各异的作品,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此外,钱谦益、吴伟业虽因屈节事清而为人诟病,但他们作为当时文坛领袖,为转变清代诗风的确起了较大的作用。继钱、吴总领诗坛的王士禛以及施闰章、宋琬、查慎行等人,也为清诗的发展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词以明末陈子龙等反映社会矛盾的作品为转机,出现了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和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出现了纳兰性德独标一格的词作,从而摆脱了明词的弱风气,步入了词的中兴时期。散文继承了先秦以来古代散文的传统,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的散文到魏禧、汪琬、侯方域以及陈维崧等人的散文和骈文,虽未结宗立派,但它转变了晚明散文的格局,扩大了题材领域,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清代有重大影响的桐城派散文,也滥觞于此时方苞的著作。

从诗、词、文理论的发展情况来看,这时的许多论述和论著不仅为整个清代的诗文理论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我国诗文理论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论,对清代诗风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从王士禛、叶燮、冯班、吴乔、赵执信等人的诗话开始,整个清代的诗话约有三、四百种;从朱彝尊等人的有关词论开始,流传至今的清人词话,也多达数十种。它们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其评论范围和系统化、专